

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 与内在悖论*

王 浩

【内容提要】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发展的思想源流与实践动力,其世界观强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方法论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改良主义。起初,自由主义以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为手段,致力于遏制政治权力扩张。然而这一观念走到极限,使得垄断资本在镀金时代凌驾于美国民主政治之上,最终引发经济社会危机。此后,实用主义式的改良主义对上述观念进行了修正,进而揭示出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间的一项悖论:前者将个人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后者却看到了其局限。结果是,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实践中衍生出了两种变体:民主党式变体即当代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权力扩张也会损害政治民主,改良的目标应为市场监管与经济平等;共和党式变体即新自由主义则宣称财产权是支配性的,政府无权干预经济。上述两种自由观念的张力推动美国政治形成了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之先后经历了以政党“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及以政党“对等极化”为特征的新镀金时代。基于此,作者认为,美国政治演化的动力在于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由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来的观念张力与政治二元结构,其深层逻辑则在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有着难以解决的悖论。“特朗普现象”就是这一悖论在新镀金时代终结时的产物。

【关键词】 美国政治;自由主义;政党极化;新镀金时代;特朗普现象

【作者简介】 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7)

08-0064-24

* 本文是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中肯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备受瞩目的2016年美国大选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反建制”为旗号引发了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场“地震”,并因此成功入主白宫。这场选举政治“地震”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构成民主党稳固票仓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分裂,从而激起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是否正在开启新一轮政党重组(partisan realignment)的思考。^①传统上,民主党的东北部政治联盟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新英格兰地带(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带(Middle Atlantic)以及大湖区“铁锈地带”(Great Lakes/Rustbelt),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湖区“铁锈地带”的几乎所有州在本次大选中都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并由此构成了特朗普最终得以胜出的关键性力量。^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上述区域对美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严重不满,变革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种不满和对变革的诉求并非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自所谓“新镀金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活动为形式有所展现,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治选举为方式的一种集中且大规模爆发。^③

回顾美国历史,变革一直是其政治发展的主题。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言,“美国人总是喜欢变革而害怕发生革命”。^④这句话指明了两点事实:第一,美国人因其自由民主体制而自豪,不希望出现对自身体制的革命性颠覆。第二,美国人不回避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张通过渐

^① 美国政治中的“政党重组”指的是两党的选民基础在某次或某几次选举之后出现持续且明显的变化,由此造成政党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旧的政党格局瓦解、新的政党格局形成。历史地看,政党重组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往往引发美国政治版图和政治走向的重大变迁。参见 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p.14; Jerome M. Clubb, William H. Flanigan and Nancy H. Singale, *Partisan Realignment: Voters, Parties and Govern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21-24; Arthur Paulson, *Electoral Realignment and the Outlook for American Democrac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② 在“铁锈地带”五州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印第安纳州全部变成了共和党的“势力范围”,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

^③ 近年来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中,“新镀金时代”的说法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概言之,它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由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而引发的以民主政治不断衰落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参见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④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p.58。

进变革加以解决。可以说,正是源于这两点政治传统,美国才得以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以及思想上同过往“决裂”等困扰,只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调适与更新,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更为稳定。^①

然而历史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尽管有着强大的变革基因,美国却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社会贫富分化以及财政赤字与“滞胀”等交替出现,使其政治发展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左与右、自由与保守以及政党政治的合作与纷争、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形成一种钟摆式循环往复。^② 例如,今天美国社会中所谓“99%的大多数”对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1%的建制派精英的不满所折射出的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人们对于大企业与垄断利益集团的愤怒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政治学者才将今天美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镀金时代”。在实践中,美国政治演化的这种钟摆式运动轨迹,逐渐削弱了其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③结果是,以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愈演愈烈的政党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为标志,美国的民主体制出现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称的“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④

上述两方面事实给我们带来了三点研究困惑。第一,美国政治中的变革传统源自何处? 第二,以变革为主要手段,在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推动美国政治周期性演化的关键力量有哪些、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学逻辑? 第三,强大的变革基因为什么不仅没有帮助解决美国长期面临的根本性经济、社会挑战,反而使其政治发展逐步陷入意识形态斗争和党派两极对立(hyper partisanship)的困境,进而对其民主体制造成伤害? 为了找到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致力于从对作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界定与分析入手,通过历史回顾、学理总结与逻辑反思厘清美国政治的演化线索,并运用这一线索对当前炙手可热的“特朗普现象”进行初步探讨。

①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9页。在美国学者赫伯特·贝斯等人看来,这种变革传统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WASP)的一种“特质”。参见Herbert J. Bass, George A. Billias and Emma J. Lapsansky, *Our American Heritage*, New Jersey: Silver Burdett Company, 1978, p.40。

②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356。

③ 关于对这一趋势的经典研究,参见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④ 参见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2014。实际上,美国政治史上的政党极化现象并非一种晚近现象,只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极化趋势体现为两党的“对等极化(deeply and closely divided)”,即两党在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出现了两极化趋势,由此加剧了国内政治僵局。参见Ronald Brownstein, *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7。

二 自由主义与美国政治的变革传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智力副产品,反映了正在崛起的工业中产阶级的期求。^① 结合当时人类社会由前工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的时代大背景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从诞生时起便被赋予了两点基本意涵。第一,它帮助人们逐步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发现了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是人类找回自我的标志。在中世纪,人类将希望寄托于神祇拯救他们脱离恶劣的尘世,然而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发现,却逐渐激发了人类对运用自身潜能改善物质环境的信心。此后,这种信心又由物质层面延伸到了更高一级的思想层面:人们开始认为,如果科学问题能够通过个体理性加以解决,那么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也可以运用理性来解决。^② 第二,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主要是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他们不像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者(radicals)那样对社会感到失望,而是致力于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构建理想的社会。因此,自由主义重视法律的概念,希望以合法的程序寻求体制内变革,认为只有渐进主义才是科学主义的体现,也是实现相对深远和进步性变革的保障。^③

上述两方面基本意涵提供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得以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理论“基底”。首先,对于个人及其理性的强调使之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事物,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因此成为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④ 具体而言,个人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坚持人类个体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信念,反对任何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对个人进行控制,认为个人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和权威。以此为出发点,政治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著作《政府论》中提出,建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侵犯。^⑤ 为此,政府的权力应受到严格制约,它只需作为一个被动仲裁者,让人们追求对他们自己最好的利益。^⑥ 理性主义则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理性的结构,它可以通过对人类理智的运用获得揭示。由此,自由主义者确信个人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对事物做出明智的判

①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5, pp.14-17.

② George Crowder, *Liberalism and Value Pluralism*,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8.

③ Leon Baradat,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9, p.22.

④ Marcus Paskin, *Liberalism: The Genius of American Ideal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04, p.37.

⑤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Governmen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6, pp.87-88.

⑥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Governmen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p.84.

断,并且他们就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和维护者。^①这一理念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表述得相当明确: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其次,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则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于看待事物的科学主义精神、对人类理性的乐观态度以及以工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身份,自由主义者对于现实的不满程度显著低于激进主义者,但他们仍然能够充分认识到既有社会中存在的缺陷,因此渴望对体制进行改革,只是拒斥对于体制的颠覆性破坏,主张通过法律方式和合法程序实现渐进性的进步变革。^②

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美国政治的实践层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成功摆脱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后,美国人坚信政府是一种“恶”的存在,必须对其权力进行严格限制,才能有效保障个人自由和其他权利。因此,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颁布的美国宪法成了“美国版”自由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这两个文件也成为美国政治的“圣经”和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③“美国版”自由主义在政治实践中吸收了洛克和斯密的思想,要求限制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依靠市场调节供需关系;政治上强调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防止其损害或妨碍个人自由;而在社会生活中,“美国版”自由主义则主张人们承担起对自己生活的责任而不依赖于政府,依靠个人努力奋斗来实现“美国梦(American Dream)”。可以说,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原则都散发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后者也因此成为此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施政的根本理论基础。按照托克维尔的总结,“美国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它坚定地相信自由对于实现任何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人自由的关切激发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绝对权力”。^④从立国时起,自由主义的这些理念便成为美国人的共识,也构成了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⑤在这一基础之上,美国人迸发出了巨大的创造活力,使这个年轻的合众国一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持渐进改革的态度——也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被发挥得比欧洲大陆及英国更为充分,这一特点成为美国两百

① Andrew Heywoo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45.

② Leon Baradat,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p.23.

③ Peter Woll,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10, pp.31-39.

④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45.

⑤ 参见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余年来得以实现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本身就是美国本土生长的哲学流派,对美国社会乃至美国人性、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实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只注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只关心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而对纯人文的道德伦理嗤之以鼻。^②因此,“美国版”自由主义对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态度相较于欧洲更为灵活,也更加务实。^③此外,作为一支独特的中间力量(intermediate force),美国强大的市民社会也在推动国内改革方面发挥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作用。^④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改良主义成为“美国版”自由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并在实践中推动形成了美国政治的变革传统。概言之,这种变革传统在政治上往往通过小周期性质的政党轮替执政与大周期性质的政党重组得以体现,其中后者在美国政治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实践推动者角色。

三 自由主义的内在悖论与美国政治的裂变

(一) 美国自由主义的早期成功及原因

在美国立国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一方面,建立在有限政府原则基础上的政治理念使得代议制民主成为美国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其中主要包括政府权力分立、竞争性选举以及两党制。这些制度安排在有效保障个人自由不被政治权力侵犯的同时,也为个人提供了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手段,并由此推动了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⑤另一方面,建立在自由竞争原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压倒性的支配作用,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个人的创造活力,推动美国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实现了高速发展。到19世纪末时,美国已崛起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发达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⑥

自由主义取得的这些成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首先,美国的工业化

① John Dewey, “Pragmatic America,” *New Republic*, Vol.30, No.4, 1922, p.185.

② 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7页。

③ 金灿荣编:《美国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④ 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第44—46页。

⑤ 参见约翰·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⑥ 美国的工业规模在1894年超越大英帝国成为全球第一。参见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378—380.

进程是在其大陆扩张时期完成的,这就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从1776年到1898年,美国仅用五千多万美元和几次小规模战争,就顺利地在大西洋西岸扩展到太平洋东岸,领土面积由最初的80万平方公里猛增至937万平方公里。持续西移的边界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进”也随之成为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①其次,工业革命创造的技术前提连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利的市场环境提供的创新沃土,对美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助推作用。历史研究表明,美国早在19世纪初便开始发展工业经济,到内战前已经具备完善的工业基础。^②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环境下,工业化对个人提供了事业成功和发财致富的机会。由此,以电力、石油和钢铁产业的崛起为代表,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尚未突显,以男性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文化与自由主义理念实现了高度契合,强调开拓精神、创新意识及辛勤工作,这就为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增添了强大的思想和实践动力。^③

然而,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从19世纪后期开始却变得问题丛生,直接原因在于上述有利于这一模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复存在。首先,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放任政策已与新的经济模式不相适应:垄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创新环境,在产生阶级固化趋势的同时,劳资矛盾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④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导致美国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社会问题日益积累,尤其是贫富差距增大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与之相关,族群冲突越来越成为美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最后,由于大陆扩张走到尽头、美国边疆趋于封闭,此前自由主义粗放式发展所仰赖的空间及经济、社会矛盾得以消解的缓冲区间大为缩小。^⑤

(二) 镀金时代:美国政治的“非对等极化”与自由主义的“失灵”

19世纪后期美国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自由主义面临的问题反映到政治实践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南北战争后美国政党出现的大规模重组与日趋显著的政治精

① 艾伦·布林克利著,邵旭东译:《美国史(1492—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② 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第497页。

③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0页。

④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16.

⑤ Robert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ter 8.

英主义(elitism)倾向。^① 1865年内战结束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这一联盟由东北部金融、工商业利益集团与西部农牧业利益集团构成,主张联邦主义、高关税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加速推进工业化及海外扩张。^②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卡尔·莱德(Carl Ladd)的说法,共和党已逐步演化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③ 正是当时在美国国内位居主流的上述施政理念,加剧了19世纪后期伴随美国高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和对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④ 例如,内战前美国几乎没有资产百万以上的富豪,而战以后石油和铁路大亨等为代表,美国的百万富翁便急速增长,到1892年时超过了4000人。^⑤ 以此为背景,东北部工业、金融寡头和中西部农牧场主被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描绘成贪得无厌的利益追逐者和美国政治走向腐败的幕后操纵者,这一历史阶段则被他称为“镀金时代”。^⑥

镀金时代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另一面,是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主党。此前,民主党一直奉行“杰克逊式民主”,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然而,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使农民、工人和广大新外来移民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民主党随之转向其当代理念,主张以“积极政府(active government)”保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利益。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89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开始呼吁关注“挣扎中的民众”、制约工商业寡头权力;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则极力维护既有自由主义的施政路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⑦ 至此,现代意义上的美国两党制初具雏形,关于美国究竟应该管控还是顺应自由市场才能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争论,也在此后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⑧

① 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34-169.

② Ronald Brownstein, *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 pp.29-32.

③ Carl Ladd,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Respons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p.46.

④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5, pp.114-120.

⑤ 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第506页。

⑥ 马克·吐温著,春燕译:《镀金时代》,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⑦ James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pp.28-32.

⑧ Ronald Brownstein, *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 p.28.

基于镀金时代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与日渐浮现的观念冲突,民主共和两党间的“非对等极化(deeply but not closely divided)”成为政治过程的常态模式,其中共和党及其自由放任政策始终主导着国内政治议程。在此期间,由四位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罗得岛州的纳尔逊·奥德里奇(Nelson Aldrich)、艾奥瓦州的威廉·艾利森(William Allison)、康涅狄格州的奥威尔·普莱特(Orville Platt)和威斯康星州的约翰·斯普纳(John Spooner)——组成的保守派联盟(Big Four)牢牢掌控着国会权力。到20世纪初时,随着上述四位议员的式微,共和党内出现了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分裂,进而导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作为自19世纪末起一直到大萧条前唯一的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总统宝座。然而此后,共和党内分裂很快便让位于党间斗争:正是共和党进步派对威尔逊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持激烈反对意见,才使这一时期的政党极化史无前例。^①结果是,20世纪初昙花一现的进步主义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自由主义路线,也没有改善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反而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政策登峰造极的时期。

自由主义的理念走到极限,使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从市场竞争转变成了市场“专政”。^②在此期间,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帮助垄断资产阶级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贫富分化愈发严重,最终造成生产过剩和消费匮乏。以大量资本涌入股票市场形成金融过度投机为导火索,一场巨大的经济进而社会危机摧毁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心。大多数经济理论家突然发现,原先被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市场调节理论失灵,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竟然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开始对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进行反思,由此引发了自由主义的裂变、美国政治力量的重组及其当代政治二元结构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主义蕴含的内在悖论与美国政治演化的根本逻辑。

(三) 自由主义的内在悖论与美国政治的裂变

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从19世纪后期开始暴露出的缺陷植根于其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内在信仰之中。前文已经阐明,这一信仰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对于人类运用自身理性实现个人追求、改造现实世界以达至理想社会的前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因此主张个人权利优先、有限政府以及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说,这一“美国版”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工业中产阶级以及白人盎格鲁—

^① James Holt, *Congressional Insurgents and the Party System, 1909-191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81-94, pp.106-120.

^② 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第315—320页。

撒克逊新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现代国家的建立连同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逐步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政治精英主义特征、经济不平等性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在镀金时代美国国内政治不断极化、经济走向市场“专政”化以及社会贫富悬殊和劳资矛盾趋于深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者角色。^① 最终,不加约束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引发了巨大的非理性灾难,甚至导致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大萧条形成的现实与心理冲击中,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渐进改良——开始对美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和变革,并试图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加以修正。实际上正如前文提到的,早在19世纪末美国政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两党制时,民主党便已看到了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问题,认为与政治权力扩张必然侵害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一样,经济权力扩张带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同样有违政治民主的本质。因此,民主党开始倾向于以“积极政府”推动经济平等。然而,在镀金时代自由主义理念根深蒂固以及两党形成“非对等极化”政治格局的背景下,平等观念无法与自由观念相提并论,这也是进步主义改革最终未能扭转自由主义模式连同美国政治格局的原因。以大萧条带来的变革呼声为强大动力和催化剂,美国政治开启了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轮政党重组——1932年重组。^② 在这轮重组中,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部迅速扩展到了东北部,其崛起使得当代美国政治的两党对等模式彻底成型。^③ 凭借当时极为有利的时代条件,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上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民主党在实践中逐步完成了自由主义从反政治权力到反经济权力、从有限政府到积极政府、从经济的自由放任模式到凯恩斯主义模式、从信奉发展理念主导的消极自由到提倡平等理念主导的积极自由以及从政治文化的精英主义到普遍主义等的过渡,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式变体。^④

① 唐士其:《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17页。

② 关于这轮政党重组对于美国政治影响的系统性论述,参见 David Burner, *The Politics of Provincialism: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ransition, 1918-1932*,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Gerald Gamm, *The Making of New Deal Democrats: Voting Behavior and Realignment in Boston, 1920-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Carl N. Degler,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ity: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51, No.1, 1964, pp.41-59.

③ Richard Bense, *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80-198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62.

④ 凯恩斯主义是指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来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参见 Leon Baradat,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p.134。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干涉而做出选择的定义是一种消极自由,积极的自由应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然而,对于体制的反思与改革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能够被轻易颠覆。虽然罗斯福新政以及1932年重组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但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及其相应主张依然在美国政治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例如,以1938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迅速在参众两院收复失地为标志,保守派在国会中形成了一支有效抗衡“新政(New Deal)”法案的力量。^①因此,当代自由主义对于美国政治的改造并未使其全然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而是造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裂变:在民主党式变体的另一面,是中西部共和党连同南方部分保守派民主党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信仰。^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在实践中有效推进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议程,从罗斯福到肯尼迪等民主党总统才不得不通过在诸多社会政策上与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以及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进行妥协,以构建并尽力稳固“新政联合体(New Deal Coalition)”。美国政治格局在大萧条后步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过渡期:以新旧观念的碰撞连同政党重组带来的张力为诱因,一种“四党制(four party)”或曰两党“对等合作”的模式成为新政时代特有的国内政治现象。^③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崛起所导致的当代自由主义的过度伸展以及凯恩斯主义发展模式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包括财政赤字的迅速增长、经济发展陷入“滞胀”以及民主党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式福利国家流于空想,美国的社会矛盾因价值观念冲突而被再度激发出来,最终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政联合体。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共和党跨越区分美国南北部地理分界线的“梅森—迪克逊线(the Mason-Dixon Line)”,通过所谓“南进战略(Southern Strategy)”使保守的南方逐渐与民主党分道扬镳。这一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来自南方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数量呈现骤降之势:1947年,南方民主党国会议员占国会中民主党全部议席的60%;而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降至30%。^④日益自由化

① Ronald Brownstein, *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 p.55.

② 美国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人虽然大体认同当代自由主义关于积极政府和市场监管的理念,却难以接受多元主义的社会文化理念,因此重组后民主党政治联盟内部的张力存在于南方保守派与东北部自由派关于社会改革的分歧之中。

③ 所谓“四党制”,指的是在这一特殊的过渡阶段,两党内部都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意识形态不再以党派划线;两党“对等合作”则是指在两党势均力敌并且意识形态不以党派划线的情况下,政治共识的达成需要两党之间以及各党内部实现相互妥协与合作。

④ Martin Wattenberg, “The Building of a Republican Regional Base in the South: The Elephant Crosses the Mason-Dixon Lin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55, No.3, 1991, pp.424-431.对于这一时期美国南方政党重组的专门分析,参见 Earle Black and Merle Black,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Sou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Nicol Rae, *Southern Democr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的美国东北部则成为民主党的坚强堡垒,共和党内传统的温和派/自由派在这一区域逐渐式微。^①经过这一轮政党重组,“对等合作”时代两党在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上相互重叠的状况一去不复返。随着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联盟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同时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南部—中西部联盟转而日趋保守化,当代美国政治由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来的观念性张力以及由这种张力塑造的精英主义/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积极自由对立的二元结构,最终以两党“对等极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②

20世纪60年代末开启的这一轮政党重组以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压倒性胜利而宣告完成。在里根赢得大选的当晚,美国《华盛顿邮报》著名政治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David Broader)写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③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变革传统在时隔数十年后推动其政治发展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次,变革的动力在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结束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走向困境,人们对美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理念感到不满,认为它导致了联邦政府机构臃肿不堪、财政赤字与日俱增、经济活力下降与“滞胀”频发、主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被社会改革所稀释以及对外战略过于理想化以至于酿成越南战争悲剧等。结果是,美国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对立面——“新右派(New Right)”逐渐崛起为一支极具影响的政治力量,一种致力于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取向、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发展理念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原则,其中有限政府、减税、平衡预算以及对金融监管的松绑等构成了这一理念的核心,并且相较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强调了财产权和私有化的重要性,认为“私即好、公即坏”;同时,这一理念将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从国家层面推广到了全球层面,认为全球化可以让这些原则得以被更好地落实并扩展。^④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及其以“里根革命”为标志开启的所谓新镀金时代,实现了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一次“反叛”,美国政治的演化路径再一次朝向了个人主义—精英

① Nicol Ra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Republicans from 1952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对于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演化逻辑的专门分析,参见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4—31页。

③ David Broader, “A Sharp Right Tur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like See New Er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1980.

④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以及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政治哲学家。

主义,并且这一模式在冷战后被进一步强化。^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自美国内战后逐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两党政治模式以来,以变革为根本手段,以政党重组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连同相应国家治理观念的更新作为变革的主要形式和政治周期性演化的关键动力,美国政治完成了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的历史变迁。在政治变革和政党重组背后,则是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因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形成的两种自由观念的张力以及在这一张力作用下不断固化的以精英主义/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积极自由两极对立为特征的政治二元结构。因此,上述观念、结构、动力和手段的层层递进与相互嵌套构成了美国政治演化最为直观和清晰的逻辑。在厘清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作为美国政治演化的思想源流与实践动力,自由主义产生观念性裂变的学理根源是什么?从这一点进行切入,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关于美国政治演化逻辑的更深层结论?笔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裂变植根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内在的一项学理悖论。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由农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的智力产物,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通过启蒙运动找回了人性,并在观念上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其他一切社会事物之上,认为依靠人类理性能够实现改造现实世界、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这就在意识形态上将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内化为了一种信仰。然而另一方面,工业中产者的阶级身份又令自由主义者在改造现实世界、构建理想社会的方式选择上显著地稳健于激进主义者,主张以渐进改良为手段推动体制内变革,这一点成了自由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并且本质上反映出一种对于人类及其理性的审慎乐观,甚至相较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改造世界的手段意味着其看到了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无法摆脱的局限性。因此,当代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变与冲突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有着一项难以解决的内在悖论,这一悖论构成了美国政治演化的根本逻辑基础。

从上述结论出发并结合美国政治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自19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起,在自由主义世界观对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挥之不去的信仰冲动与其方法论对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制约和修正之间,始终存在激烈的相互角力。正是在这一角力之下,美国政治才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往复的特征,在实践中先后经历了当代自由主义改造古典自由主义,以经济平等化、社会结构中间化与政党“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以经济金融化、社会贫富分化以及政党“对

^① 强化的标志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等极化”为特征的新镀金时代。接下来,笔者将分别对美国政治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演化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从而为我们理解今天美国政治的现实提供学理和逻辑前提。

(四) 新政时代:当代自由主义与政党“对等合作”模式的形成

1950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下设的政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声称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党政治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非政治(apolitical)特性,政治辩论和斗争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两党制的监督功能逐渐弱化,美国因此正面临着民主异化的危机。^①的确,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政治图景已远不如19世纪末那样党派极化、充满斗争,而是越来越朝着政治光谱的中心靠拢。正如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O. Key)指出的,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和二战的结束,社会阶级作为美国不同党派利益标签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②

二战对美国制造业生产形成的巨大刺激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战后15年“黄金期”,是上述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194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0%,由200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5000亿美元。此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国内平均高达15%—25%的高失业率到了五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5%甚至更低水平,同时物价上涨率也仅在3%或以下徘徊。经济繁荣的直接效应是,1960年美国人的平均购买力比1945年增加了20%以上。到1969年,美国的人均年收入(包括所有男性、妇女和儿童)已经超过1800美元,比15年前增长了500美元。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人民生活中的最高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美国社会的健康、活力和自信:富裕的人们开始发展出日益发达的“消费文化”,现代美国西部的崛起、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性,都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以至于“新边疆(New Frontier)”和“伟大社会”等充满鲜明的当代自由主义色彩的远大设想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③

①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4, No.3, 1950, pp.v-96.

② V.O. Key,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58, p.274.

③ 以上数据和资料参见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第825—826页。导致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以及社会繁荣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点:(1)政府消费(包括投资学校、住房、老兵福利、社会福利以及1956年开始的1000亿美元“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建设)显著刺激了经济增长;(2)朝鲜战争导致的军备开支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美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3)科技进步对于经济繁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技术发展使美国战后第一个十年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5%以上,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4)“婴儿潮”从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从而使美国社会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后劲也十分充足;(5)城市郊区的快速发展对于汽车工业、住房建筑业等的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参见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91页;威廉·本内特著,刘军等译:《美国通史》(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44页。

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经济增长是政治纷争的“止痛剂”,经济衰退则极易引发政治动荡。因此,新政时代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镀金时代造成的阶级冲突逐渐淡化,政治领导人由此便得以在一系列议题领域找到一个国内政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①正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模糊的现实,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伯纳姆(Walter Burnham)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写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困惑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内缺乏一种阶级分明的政治秩序。”^②

社会阶层差异的缩小以及利益冲突的弱化,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连同政治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开始日益呈现出一种“中间化”的演化趋势。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走向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③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集中表现为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两党“温和派”势力开始逐渐占据政治主流(如图1),并且议员的“跨党派”式投票也逐步成为国内政治过程中的普遍行为模式。此外,伴随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理念的崛起,两党对等模式已经形成,因此任何国内政治倡议要想在国会两院通过,都需要两党间的相互妥协与合作。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有利的时代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政党重组、社会结构中间化以及意识形态淡化等的作用下,美国政治才得以在新政期间尤其是二战后形成一种“对等合作”模式,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议程的落实和扩展。当然,对等合作以及当代自由主义得以发展的政治基础——新政联合体——本质上是美国南部和东北部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演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出现的问题以及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因民权运动等产生的过度伸展,这一政治联盟最终走向瓦解,由此引发了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以及国家发展理念的“回摆”。

(五)新镀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与政党“对等极化”格局的固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越南战争、经济社会危机、新左派(New Left)的衰落以及“伟大社会”的破产为标志,美国陷入了战后历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境地,当代

^① 研究表明,美国历史上的两党合作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参见 Peter Trubowitz and Nicole Mellow, “Going Bipartisan: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20, No.3, 2005, pp.433-454.

^② Walter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p.304.

^③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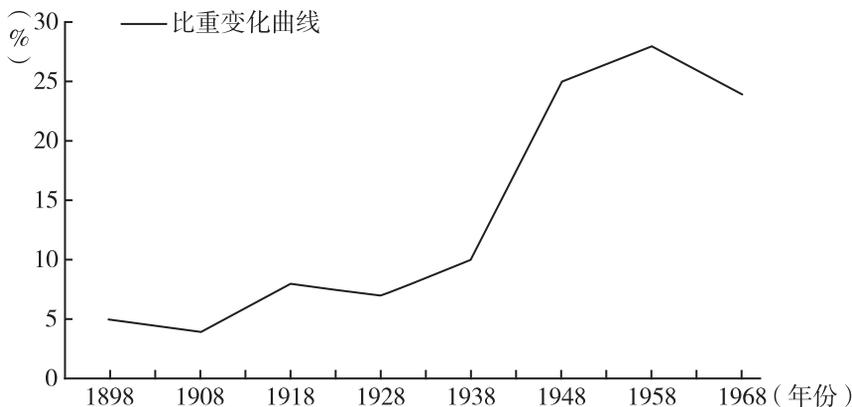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国会中“温和派”所占比重变化(1898—1968年)

资料来源:Sarah Binder, “The Dynamics of Legislative Gridlock, 1947–19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3, No.3, 1999, pp.519–533。

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因此由盛转衰。^①在此过程中,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开启的政党重组使美国政治逐步过渡为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南部—中西部“对等极化(deeply and closely divided)”的格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反叛”,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而逐步削弱了其政治民主赖以生存的土壤——市民社会。随着党派斗争、国家治理观念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分裂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再一次趋于两极化,“新镀金时代”成为政治学者描述这一阶段美国政治的关键词。具体而言,新镀金时代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的“对等极化”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镀金时代政治精英的“跨党派”投票模式逐渐被日趋严格的政党纪律所取代,政党极化以及由此伴随的政治僵局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②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学界曾普遍抱怨民主、共和两党间意识形态差异的缩小致使国内政治民主出现了异化,尤其是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讽刺的是,新镀金时代的政治学者却开始日益担忧美国国内日趋严重的党派极化令政治运转变得极为低

^① 新左派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的青年激进分子,其反美国主义的基本立场招致了民众对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反感和疑虑。参见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226页。

^② Sean Theriault, “Party Polarization in the U.S. Congress: Member Replacement and Member Adaptation,” *Party Politics*, Vol.12, No.4, 2006, pp.483–503; Jeffrey Stonecash, Mark Brewer and Mack Mariani, *Diverging Parties: Social Change, Realignment, and Party Polarization*, Boulder: Westview, 2003.

效,甚至经常出现僵局。归根结底,造成新镀金时代政党“对等极化”的原因在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启的新一轮政党重组。在此期间,共和党实施“南进战略”,到 2000 年该党候选人乔治·布什赢得总统竞选时,其选票基本上被锁定在了一个巨大的“L”型区域,即从蒙大拿州向南到亚利桑那州再折向北到佐治亚州。至此,新政时代东北部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又被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人(the Rockefeller Republicans)——已经从该党党团(party caucus)中彻底消失,共和党因此变得越来越保守,其政治根据地也决定性地向南、向西开拓。^①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则越来越集中于东北部与太平洋沿岸等更为自由化的区域。例如,曾经作为两党激烈竞争赛场的新英格兰地区,冷战后彻底成了民主党的票仓。此外,新政时代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在此期间则逐渐式微,民主党党团因而进一步向左靠拢。毫无疑问,这一政党重组完全逆转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美国国会各州选派的议员所具备的跨党派特征,使得国会在新镀金时代成为以党派划线的政治斗争的场所(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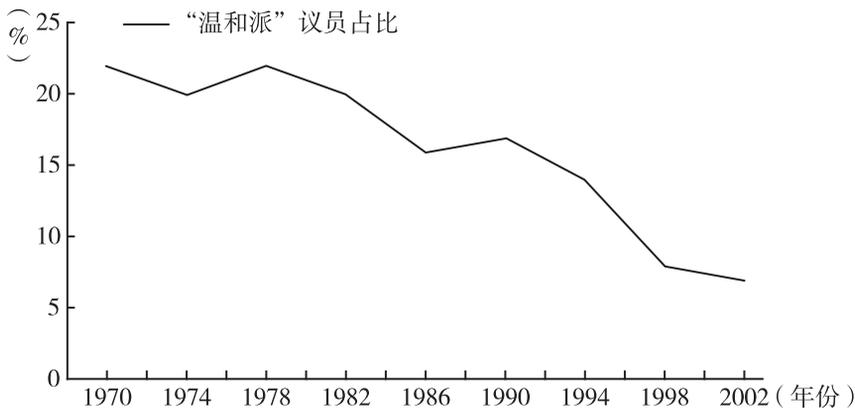


图 2 美国国会“温和派”力量的衰落(1970—2002 年)

资料来源: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Nominate Score Data,” <http://voteview.uh.edu/>, 访问时间:2017 年 6 月 20 日。

经济变迁导致的社会利益尖锐冲突是新镀金时代美国形成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及其相应两大政党“对等极化”格局的根源。在此期间,东北部的“去工业化”过程逐步终结了其作为美国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新兴产业、劳动力和资本开始涌向西部和南部的广大“阳光地带”。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在新政时

^① 关于共和党自由派在此期间的衰落,参见 Nicol Ra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Republicans from 1952 to the Present*, 1989。

代进行合作与妥协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分别代表上述两大区域及其社会联盟的政治精英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开始产生日益深化的分歧和冲突。意识形态的极化在政治过程中愈演愈烈;在新政时代,美国的两大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大量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但经过这一轮政党重组后,两党都“净化”了各自的意识形态,自由派几乎都倒向了民主党,保守派则都投向了共和党。此外,新政时代社会结构的中间化使得美国社会中存在很大一部分中间选民(最多时约占全体选民的1/3),而新镀金时代以来这一比例则逐渐下降至不足15%。^①这些趋势在政治过程层面使得任何一个党派的政治人物都失去了进行跨党派合作的动因,因为从个人政治理性出发,最为安全的选择就是替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极化了的社会利益在国会中“发声”。^②

除经济因素外,美国政治的代际转化(generational change)也弱化了政治中间主义的力量。冷战后,成长于二战时代的政治精英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退出美国政治舞台。例如,在新政时代的第90届美国国会(1967—1968年)参众两院中,有超过3/4的议员曾在二战的军队中服役,而到第109届国会(2005—2006年)时,这一比例已下降至不足30%。^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109届国会中超过90%的议员是在1988年之后选举产生的,他们完全没有新政时代党派合作和相互妥协的经历;相反,他们有的却是走向极化的意识形态和日益严格的政党纪律。^④

其次,新镀金时代美国的社会结构因人口和阶层剧烈分化而日趋两极化,因此演变成政治冲突的原因及其表征。一方面,新镀金时代美国人口的重大变化加剧了“蓝州”和“红州”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人口的迁移使其政治版图日益“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按照著名人口学者威廉·弗雷(William Frey)的说法,冷战后的美国已经彻底分裂成“两个美国(two Americas)”:^⑤一个是作为广大外来移民目的地的、由多种族和多民族人口构成的东西海岸及五大湖区,它们成为自由化政策和民主党的支持者;另一个则是由中产阶级构成的、以新兴产业为主体的南部和中西部小城镇区域,它们成为保守派共和党的国内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镀金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也与政治的不断极化互为因果。对于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新镀金时代以来工资性收入的增速普遍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尤其是新自由

① 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234页。

② David Rohde, *Parties and Leaders in the Postreform Hou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③ Andrea Stone, “For a Few in Congress, War Is a Family Concern,” *USA Today*, December 6, 2004.

④ Norman Ornstein, Thomas Mann and Michael Mald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2005–200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6.

⑤ William Frey, “Metropolitan Magnet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3.

主义浪潮及其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更是导致美国少数精英和广大民众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① 例如,美联储2011年发布的《2007—2010年美国家庭财产变化报告》显示,2007年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为12.64万美元,2010年则下降到了7.73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数据几乎等同于1992年的水平;^②然而,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却由2007年的34.1%上升至2009年的37.1%。^③ 在这一趋势之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5年年底发布的一项题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的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的中等收入人群约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则为1.213亿,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跌破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④ 这就意味着,随着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被日益侵蚀,美国的社会结构正趋于极化,因而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精英在政策选择上的妥协空间难免所剩无几。

最后,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格局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⑤ 在经济政策上,反映共和党及其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减税、平衡预算以及小政府观念等成为主流,这一方面使得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扭转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发展困境(尤其是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膨胀),从而使其经济重新迸发出创新活力,并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以及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因而成为2008年经济进而社会危机爆发的远因。在社会政策上,反映当代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肯定性行动”、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语教育等得到了高校、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因而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理念在此期间被充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中,甚至发展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规范。从上述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治以精英主义/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积极自由为特征的二元结构在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的背景下,分别占据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主流。这一分裂现象表明,美国国内在此期间存在两种明显相互矛盾却又势均力敌的政治诉求:一是希望共和党人确保美国的自由与安全,二是希望民主党人保障美国的社会多样性和开放特征。

①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chapter 1.

② “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07 to 2010: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Vol.98, No.2, 2012, p.17.

③ Annalyn Gensky, “How the Middle Class Became Underclass,” http://money.cnn.com/2011/02/16/news/economy/middle_class/index.html, 访问时间:2017年4月23日。

④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9,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访问时间:2017年4月16日。

⑤ 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234页。

总之,由于美国政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政党极化趋势,并且伴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这一时期很容易被政治学者拿来与一百余年前的镀金时代进行类比,因而“新镀金时代”的提法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然而,与镀金时代政党的“非对等极化”不同,新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形成了政党“对等极化”这一更为糟糕的局面,特别是从2000年布什以颇具争议的方式赢得总统竞选开始,美国政治的“50—50”现象成为学界普遍担忧的一大问题,政党斗争及其引发的政治僵局甚至政府关门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这严重地削弱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效率。^①这种“对等极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也打破了长久以来为政治学界所公认的“唐斯定律”,使得政治选举越来越成为“押注”一方才有可能成功的侥幸游戏,从而使美国政治不再致力于寻求共识、实现妥协以解决问题,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斗争与偏见。^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对于美国民主的负面影响远甚于镀金时代。

四 “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政治在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格局之下所引发的斗争与僵局及其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下积累的一系列深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最终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爆发出来。这些问题和矛盾表明,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以2016年美国大选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朗普现象”以及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的出现为标志,美国政治的新镀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具体而言,上述变动态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领域,自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竞争的核心议题,因而党争“外部化”趋势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国内议题导向性,使得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逻辑不复存在。在新镀金时代,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突飞

^① Ronald Brownstein, *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 2007; Michael Barone, “The 49 Percent Nation,” *National Journal*, Vol.33, No.23, 2001, pp. 1710-1716; Nicole Mellow, *The State of Disunion: Regional Sources of Modern American Partisanship*,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唐斯定律指的是,在一个两党竞争的选举结构下,政治立场越靠近中间的候选人胜算越大,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温和派的人数最多,所以越靠近中间立场就越能覆盖尽可能多的选民;其结果是,两党在政策立场上会趋同。参见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章。冷战后美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于该定律的颠覆,参见 Andrew Gelman, et al.,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猛进给美国带来了制造业空心化、移民流动和贸易赤字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引发了来自美国本土主义者的强烈反弹,正是后者在2016年大选中成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这一现实表明,美国两党的基本选民群体连同其政策偏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民主党日益呈现出的支持全球主义的态势,很可能致使其在这一轮政党重组后彻底失去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的支持。考虑到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这一趋势将变得更加不可阻挡。^① 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民主党的政治联盟将在此轮重组后转化为由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所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或多元主义倾向的群体。^② 另一方面,白人蓝领中下层倒向共和党的原因首先在于经济因素,即特朗普关于重振制造业、“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使得这一社会阶层看到了有别于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自身最为关切的就业问题的前景。如果这些经济政策在特朗普任内成为共和党的主流政策,共和党就有望将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蓝领中下层巩固为其重要的政治联盟。此外,这一群体与共和党人还有着传统价值观方面的共识,这一点在下文谈到的社会政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特朗普现象”反映出今后共和党人很可能会成为代表白人蓝领中下层与南方连同农村地区保守派的本土主义政党。

其次,在社会领域,新镀金时代政党“对等极化”背景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的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包括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正在步入困境,族群冲突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同时国内要求回归个人主义的呼声正变得日益强大。^③ 在这一方面,“茶党”运动以及“重建制派”的崛起成为其中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当前美国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外部化”,因而本土主义对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反弹也会体现为在社会政策上反对所谓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致力于回归并强化美国以白人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念,族群矛盾的激化因而不可避免。第二,美国的诸多社会议题具有代际属性,这些问题的争议性和热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自身弱化的现象,因而在新的政治周期内,过去主导美国社会思潮的议题领域就难免会被新的思潮和议题所取代。例如,当前美国

^① Michael Lind, “This Is Wha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Looks Like,” *Politico*, May 22, 2016,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5/2016-election-realignment-partisan-political-party-policy-democrats-republicans-politics-213909>, 访问时间:2017年5月30日。

^② 刁大明:《特朗普时代:2016年大选与选后美国政治、外交走向》,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报告,2017年6月。

^③ 谢韬:《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溃败》,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第33—37页。

公众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已经固化。在2001年时,民调显示支持同性婚姻者在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独立选民群体中分别为43%、21%和43%,而在2016年的民调中这三个数字已经分别提升为70%、33%和61%。^①因此,在后新镀金时代,围绕社会议题而展开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烈度上会持续下降。

最后,在政治领域,新镀金时代的两党“对等极化”格局正面临新一轮洗牌的过程,而共和党已经在新政治周期的起点上占据了优势和主动。上文提到,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反映出美国国内对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建立在本土主义基础上的全面“保守化”。其一,在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保留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理念,如减税、小政府以及对金融监管松绑,但同时另一部分理念——包括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进行修正。其二,在社会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则致力于全面推翻既有的普遍主义理念,包括摒弃政治正确、强调传统价值观,同时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这一趋势表明,过去30多年两党“对等极化”的格局正在朝着有利于共和党及其全面“保守化”的方向演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共和党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两院占据绝对优势,但也面临党内整合的挑战,尤其是其政治联盟内部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力量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依然存在分歧。因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将不得不面临与“建制派”博弈的现实挑战。从特朗普执政初期的表现来看,共和党主流或“建制派”已经对其进行了塑造。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政策迅速回到了共和党的轨道,而在国内议程上,共和党内主流支持并且特朗普本人也接受的政策往往能较为顺利地推进,而一些带有“反建制”色彩的政策——如“边境筑墙”等——却陷入搁置状态。因此,未来共和党能否解决当前被部分学者称为“党内极化”的问题、有效巩固2016年大选中出现的有利于该党的政党重组趋势,目前看仍存在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上述现实和趋势表明,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变革的起点。随着新镀金时代的终结以及2016年大选中开始显露的政党重组趋势,特别是共和党利用以反全球化、反建制为旗号的“北进战略(Northern Strategy)”将其影响力扩展至民主党传统势力范围东北部大湖区“铁锈地带”,进而形成新的所谓“南部—中西部—铁锈地带”政治联盟,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更加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随着共和党及其政治联盟力量的增强,“对等极化”时代经济、社会政策分裂的格局可能被打破,美国的社会政策也将告别普遍主义/积极自由,开始再次

^① “Changing Attitudes on Gay Marriage,”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2, 2016, <http://www.pewforum.org/2016/05/12/changing-attitudes-on-gay-marriage/>, 访问时间:2017年6月3日。

转向精英主义/消极自由。此外,按照美国政党重组的周期性规律,目前也已经到了新一轮重组的时间窗口,因而美国政治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会呈现出新旧交替阶段特有的不确定性。

然而总的来看,笔者认为不应夸大“特朗普现象”对于美国政治的冲击。无论2016年美国大选中哪一位候选人胜出,美国政治都走到了又一次变革的十字路口:新镀金时代的发展模式已经行至尽头;美国白人蓝领中下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按照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的研究,也因全球化和移民问题而早已超越了对于共和党可能加剧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担忧,所以政党重组已成必然之势。^① 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实际上依然在遵循着以变革为主要手段、以政党重组为关键动力的演化逻辑,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以及党争“外部化”特征日趋显著的新背景下,这一逻辑体现为本土主义对于全球主义的不满和反弹。这就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美国本土主义思潮风头正劲以及政党重组趋势有利于共和党及其联盟的政治格局中,一种更为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路径——包括经济政策中的小政府、自由市场以及工业化,连同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流的精英主义社会文化——将会再一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当然,美国政治中的二元结构及其背后两种自由观念的张力也依然会在实践中对具体议题及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并且在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化、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博弈激烈化的今天,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会加剧美国政治的动荡和极化。自由主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所蕴含的悖论在当前美国社会因全球化冲击而进一步趋于复杂和对立的时代条件下,将会导致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内在张力对其民主体制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和撕裂。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现象”及其开启的美国政治新周期无法跳出美国政治既有的逻辑框架,而只是使之进入了一个在全球化纵深时代以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特征、以“外部化”为表现形式的党派—社会利益斗争新阶段。

五 结语

笔者从对作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及其实践动力的自由主义的界定与分析入手,通过历史回顾对美国政治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的长期变迁中,哪些因素的作用使其呈现出周期性和阶段性的演化特征以及在这些因素背后存在怎样的政治学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以变革为主要手段,美国政治演化的动力源于古典自由主

^①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chapter 1.

义与当代自由主义因分别强调反政治权力和反经济权力而形成的观念性张力与政治二元结构,其深层逻辑则在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难以解决的内在悖论:前者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后者却看到了其局限。这一悖论在美国政治实践中体现为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一方面,民主党式变体即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与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治权力扩张会损害个人自由与民主体制一样,经济权力的扩张也会损害个人自由与民主体制,因而改良应以市场监管与经济平等为目标;另一方面,共和党式变体即新自由主义则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宣称,财产权是支配性的,政府无权干预经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与自由观念的张力,推动美国政治形成了普遍主义/积极自由与精英主义/消极自由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之先后经历了当代自由主义改造古典自由主义,以经济平等化、社会结构中间化与政党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新政时代以及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以经济金融化、社会贫富分化和政党“对等极化”为特征的新镀金时代。

当前,随着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念变得难以为继,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变革的起点。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利用以反全球化、重建制为旗号的“北进战略”将该党影响力扩展至民主党传统势力范围东北部大湖区“铁锈地带”,进而形成新的所谓南部—中西部—铁锈地带政治联盟,使得美国政治出现了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趋势。这一趋势体现为在全球化时代以及党争“外部化”特征日趋显著的新背景下本土主义对于全球主义的不满和反弹。基于此,美国政治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会呈现出新旧交替阶段特有的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应夸大“特朗普现象”对于美国政治的冲击,因为按照美国政党重组的周期性规律,目前的确已经到了新一轮重组的时间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现象”及其开启的美国政治新周期依然无法跳出美国政治既有的逻辑框架,而只是使之进入了一个在全球化纵深时代党派—社会利益斗争的新阶段。

(截稿:2017年7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